

September 2013

##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ry Theory? Regarding to Stanley Fish's Non-Consequentialist Concept

Houlia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Houliang. 2013.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ry Theory? Regarding to Stanley Fish's Non-Consequentialist Concep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5): pp.35-4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5/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文学理论会产生什么后果？

——斯坦利·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刍议

陈后亮

**摘要：**文学理论一直被认为可以产生很多后果。在文本层面上，它可以改进阅读和批评实践；在社会层面上，它甚至可以带来政治改变。但费什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理论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因为它妄图以超越于实践之上的姿态指导实践、以绝对中立的视角获取对文本意义的普遍解释。文学理论充其量只是对解释行为的描述，而不是解释行为本身，因此它不会带来任何实践后果。真正影响批评实践的是信念，而非理论。但反过来，只要我们不再把理论看得高于实践，而是认识到它也只是一种毫无特殊优越性的实践形式，那么理论研究便可以带来值得期待的后果，只是这种后果绝不会逾越学术的边界，也就无法改变世界。

**关键词：**费什 文学理论 普遍解释 反基础主义

**作者简介：**陈后亮，文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电子邮箱：chenhouliang1979@aliyun.com 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2YJC752003]和山东财经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编号：B1302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ry Theory? Regarding to Stanley Fish's Non-Consequentialist Concept

**Abstract:** Literary theories have been long believed to have consequences. On the one hand, changes may be brought about in our reading experience and critical practices, and reforms may occur on the other. An entirely different argument, however, is raised by Stanley Fish, who claims that theory has no consequence because of its vain attempts to guide practice while taking a transcendental gesture so as to acquire a general hermeneutics of text from an absolutely impartial viewpoint. Literary theory is, therefore, a descriptive act of interpretation at best instead of an act of interpretation; hence, it cannot bring about any practical consequence. It is belief, rather than theory, that has a real purchase on critical practice. Nevertheless, theoretical research may bring about consequences worthy of our expectation as long as we can no longer take theory as something superior to practice but instead taking it as a form of practice. However, as the consequences could never overstep the border of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they may be powerless in changing the society.

**Key words:** Stanley Fish literary theory general interpretation anti-foundationalism

**Author:** Chen Houliang,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nd post-doctoral fellow at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ies and aesthetics. Email: chenhouliang1979@aliyun.com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渐在文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站稳脚跟。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反倒喧宾夺主，占据主要席位。在不少人看来，懂不懂深奥的文学理论甚至成为衡量文学批评水准的标杆。人们相信，理论作为高度抽象的经验方法的归纳，可以成为打开文学密码的万能钥匙，帮助我们破

解文本中一个又一个谜题，带领我们朝着“终极真理”步步趋近。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理论如日中天之际，有着“文坛怪杰”之誉的美国理论家斯坦利·费什却突然抛出一个让所有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都很难接受的“理论无后果说”，其大致意思是说，文学理论对于我们具体的批评实践来说毫无指

导意义,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使我们更接近作品中的终极意义或客观真理,因为作品本身并非超然独立于解释活动之外的客体,而是存在于解释行为的构建之中,作品中的一切——不管是语法、结构还是意义——都是解释活动的产物,它们是“事件”(event)而非“事实”(fact),作品之中其实什么都没有。不难看出,费什一方面抬高了批评家的地位,让其取代作者成为文本意义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他也严重动摇了文学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倘若理论果真如其所说不会带来任何“后果”(consequence),那么我们继续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何在?

## 一、文学理论与普遍解释

按照韦勒克在其经典著作《文学理论》中的界定,所谓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相反文学批评则是“对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韦勒克 沃伦 31)。两者相互包容,前者是在后者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韦勒克 沃伦 32),这些理论反过来又会成为批评家头脑中先入为主的“信念”(belief),进而影响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以及蒲柏的《论批评》等都可视为这类文学理论的代表。

韦勒克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符合绝大多数人对文学理论的一般认识。<sup>①</sup>然而费什却在这种一般认识上发现了重大缺陷:作为对经验的抽象概括,理论成了某种高于实践的东西,它妄图以高高在上的外部姿态、用貌似中立的普遍视角来指导和改进实践(Fish “Consequences” 110)。很多人之所以对理论趋之若鹜,就是因为迷信它可以为我们找到一种操作性强的批评方法,一旦付诸实践便可以稳妥地带来某些预期后果。有了这样的理论装备,批评者只要能够摆脱自己偏颇的语境因素和视角,就必然可以和其他运用同样方法的批评者得出类似结果。不难看出,费什对理论的理解与人们的常识存在差别,前者在外延上要比后者狭窄得多,并非所有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收集的理论都可以符合他的界定。在费什看来,理论与非理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也就是解释学家赫什(E. D. Hirsch)所说的“普遍解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与“局部解释学”(local herme-

neutics)之间的区别:

局部解释学包含的是粗略的经验而非规则[……]局部解释学可以[……]提供一些适用于大多数情况的模式和方法。而普遍解释学则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准确可靠的原则[……]正是这一特征使得这种普遍解释学有资格被称作“理论”。(Hirsch 18)

赫什在这里所说的“普遍解释学”也就是指一种操作程序,只要你严格按照它规定的步骤进行,就“总会产生正确的结论”(Hirsch 18)。而局部解释学则只是某些人基于其在某一特殊领域的成功经验得出的对各种可能性后果的估量。换句话说,普遍解释学是一种明白清晰的指令,几乎不考虑具体操作环境中的变量,它要求人们“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或只能这样做”。而局部解释则是一些仅凭经验总结出的粗略方法,尚未被理论定形,它会因为具体操作环境中的种种变量而产生预期之外的后果,它只告诉人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这样做”。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正是普遍解释学的代表。在乔姆斯基之前,人们普遍把语法理解为有限语言现象的分类和整理等经验活动的结果。但乔姆斯基认为这种传统做法“只达到对具体例子归纳分类的地步,并没有达到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对(语言的)生成规则加以系统而确切说明的阶段”(乔姆斯基 3)。他现在则要求人们开始把语法理解为每个语言主体所拥有的一套内在规则,这套规则虽然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却代表着该语言潜在的系统,可以让人们理解并制造出该语言允许实现的无数句子。语言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却不可能仅仅通过经验总结获得。作为大陆理性主义的门徒,乔姆斯基认定语法规则并非是人们从经验当中获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固有的语言能力”(2),并且与人的社会背景、生活习惯和受教育程度无关。语法就由这些抽象、普遍且亘古不变的规则构成。他说:“所谓生成语法就是指一套规则系统,该系统用某种明确的和精心设计的方法把结构描写分配给句子”(6)。这即是说,人们在不同场合下说出的句子并非是由自己自由组织的,而是由这套先天禀赋的规则系统安排完成的。

他甚至设想:“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在实际运用他们的语言知识时,不受像记忆限制、精神涣散、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以及种种(偶然性的或固有的)错误等这样一些在语法上毫不相干的条件的影响”(1)。

在费什看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也恰恰符合他对理论的一般界定。他说:“乔姆斯基的研究之所以说是‘理论的’,是因为他试图寻找的是一种方法、一种带有预先测定好的成份的秘方,只要严格按照那些明确指令来配伍这些成份[……]就会带来想要的后果”(Fish “Consequences” 110)。这样做的代价是,实践者需要绝对信任和服从这种方法,并且放弃具体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简而言之,费什所说的理论其实就是试图掌控实践的一种打算,它总想获得对文本的“普遍解释学”,“试图站在实践之外并构造一幅有关各种可能后果的抽象图景”(Fish “Doing” 325)。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它试图站在一个高于或外在于实践的位置上来指导实践;其二,它试图通过价值中立来改造实践,用一种普遍视角取代狭隘的局部视角,而个人则必须使其形成于具体语境中的观念和信念受这种普遍理性的制约(Fish “Consequences” 110)。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也正是针对这种理论,因为他认为这两种企图显然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既不存在高于或外在于实践的“飞地”,批评者也做不到价值中立,任何看似超然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其实早已被各种带有私利的价值判断预先污染。

有意思的是,对费什来说,一些常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定的“文学理论”其实并不算是理论,比如 E. M. 燕卜逊的含混类型论以及哈罗德·布鲁姆的诗的误读论。费什认为,它们从本质上都是“经验性的总结”(Fish “Doing” 325),虽然他们也声称要超越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去发掘更多文本中的规律,但他们总结出的那些规律却与个别作品的解读没有直接关系。它们只能算是“对一种有效实践的模仿”(Fish “Doing” 326),是“非常笼统的哲学信念”(Fish “Doing” 328)。我们有可能把这些规律当作法则,但这些法则既非一成不变也不具备预测能力。它们从一组有限的资料中采集出来,但可能仅对那些数据有效,也会随时间变化而需要被改写。

## 二、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

看到这里,很多人原本紧张的神经或许会暂时放松下来。毕竟符合费什所说的这种理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文学理论仍旧是可以逍遥法外的,因为它们都没有以价值中立和普遍解释为目的。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大多数理论家并不奢望可以提出一种具备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却都相信自己可以提供一个更优越的视角,让批评者更接近文本中的准确意义。人们一般认为,理论是对文本经验的描述,它或多或少反映出文本中的某些事实或真理。由于人们希望得到更充分的真理,所以我们才会不断提出更新的理论。随着我们对文本观测的深入,我们所得到的描述也越来越完美。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不断改进我们的观测和描述方法,消除偏见,最终达成对文本惟一的、准确的解释,而文本自身也期待并召唤我们向它的“意义”之核不断逼近。

费什称具有上述立场的人为“基础主义者”(foundationalist),从哲学层面讲,其最大特点在于相信世界、自我或文本拥有内在的本性、意义或真理,那是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衡量标准。新批评是基础主义的典型代表,“它喜欢以自然科学的论证模式作为自己的理论模仿对象,试图用一种远离任何个别信念的证据或完全不带偏见的客观事实去佐证某一信念或解释的唯一正确性”(Fish “Is There a Text” 365)。它相信批评主体可以清除任何偏见,用中立的眼光看待完全独立的文本客体,直至准确揭示出文本中那个稳固不变的意义实体。

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费什所说的基础主义者其实和另一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形而上学者”(metaphysician)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罗蒂批评形而上学者“仍然固执于常识[……]尤其是下面这个俗见——相信在许许多多暂时的表象背后,可以发现一个永恒不变的实有”(罗蒂 107)。“形而上学家相信,外在的世界中存在着真实的本质,而我们有义务去发现这些本质,这些本质也倾向于协助我们去发现它们”(罗蒂 108)。与之相反,费什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基础主义的。由于他没有为自己设定普遍解释者的地位,因此费什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某种“理论”,而只愿承认它不过是对实践的“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参见 Levinson 1664-65)。基础主义者相信文本只有一种

绝对正确的解释,理论之争就是围绕它来进行的。而反基础主义者则认为任何理论都不过是对世界的不同描述或建构,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更接近文本的本来面目,所谓更好的理论不过是更符合当下语境的、更有用的理论或重新描述。就像罗蒂所宣称的那样:“实在界的大部分根本无关乎我们对它的描述,人类的自我是由语汇的使用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语汇适切或不适切的表现出来[……]任何事物都可以用重新描述使其变得看起来是好的或是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用的或无用的”(16)。反基础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的重新描述比其他人的描述更接近实在真理,也否认自己接受了任何自身之外的力量。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中立的东西可以用来批评一种描述,回应一种重新描述的唯一途径就是提出另一种重新描述。我们没有一个终极标准可以用来对各种描述做出孰优孰劣的评价,正好比我们无法用一个标准来比较不同文明的优劣一样。

费什还指出:

反基础主义有时是库恩式的、有时是德里达式的、有时是马克思式的、有时是实用主义的、有时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它永远都是历史主义的。也就是说,它的策略永远是[……]去证明基础主义理论用以对抗历史、惯例和局部实践的那些标准、规范和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不过是历史、惯例和局部实践的一种功能或延伸。(Fish “Consequences” 112)

这即是说,像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这些对传统理论所设定的真理、方法和价值标准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均可归入反基础主义阵营。基础主义者相信每种理论的评价标准在于其方法的客观性以及和真理的相符性,反基础主义者则根本否认这种可能性。费什认为,批评家所属的解释群体所处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他解读文本的方式和角度,该语境由各种被所有群体成员共享的观念、信念、利益关切、主观预设和工具范畴等因素编织而成,有点接近罗蒂所谓的“终极语汇”,它是“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的一组语词,来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命提供理据”(105)。由于思想本身亦不过是对语言的运用,因此意义、真理和事实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解释语境而

存在,也就根本不存在未经解释的文本经验或本来面目。不管理论家如何努力探寻文本的内在结构,所获得的答案也不能告诉我们有关文本本质的任何知识,因为这种本质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人们提出一种理论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为了更精确地解释一个独立的文本,那么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或选择就是没有意义的,正如罗蒂所说的那样:“由于没有任何超越语汇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选择语汇的判准,批评的工作就在于看看这张相片、瞧瞧那张相片,而不是拿这两张相片和原本比较一番”(115)。大学课堂上的文学理论课一直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即通过不断积累阅读练习,学生们一定可以在阅读能力上不断突破。可现在费什却让老师们沮丧地发现,如果根本不存在对文本的唯一正解,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学生进步?如何有自信去传授他们阅读和批评的技巧?我们凭什么认为某种解释更优越?或者我们干脆反问费什,他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就是对的呢?

费什当然清楚这一反问为他设计的陷阱,但他用一种绝对聪明的回答轻松避开了。他辩称反基础主义并不要求取代基础主义成为“真理”,它连“理论”也不是。反基础主义只是一种信念,而不同信念之间只有差别没有对错。费什相信,理论——不管它是基础主义的还是反基础主义的——不会产生任何后果,能够产生后果的只是信念。即便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见解是受诸多因素(比如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学术信念等)作用的结果,这依然丝毫不会影响到他对具体文学现象做出某种判断。我们总禁不住认为自己的观点比别人、或比以前的自己更高明,而别人总显得有其荒唐幼稚之处。每当我们的信念发生改变——比如从新批评者转变为后结构主义者——我们总会有某种进步感。但费什认为,这种进步感并非由于我们对某个独立的客体有了更清晰的把握,而完全是源自我们对自我信念的坚定支持的必然结果,因为“相信某种解释即是相信它是一种更好的解释”(Fish “Is There A Text” 364)。

### 三、理论、信念与反思

如前所述,按照费什的看法,基础主义理论不会有任何后果。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既不存在独立于解释之外的、可被用作检验标准的文本事实或意义,也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方法和视角。那么人们不

禁要问,费什自己支持的这种反基础主义“理论”——更恰当的说法当然应该是“重新描述”——会有什么后果吗?它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让文学批评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淖?或者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样,让人们由此从独断论的桎梏下解脱出来,谁也别再以真理捍卫者的姿态对别人指手画脚,转而用更包容的心态去欣赏他人的主张呢?

费什干脆地回答:两种后果都不会有。首先,担心反基础主义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费什非但没有赋予批评主体绝对的自由,反倒让他牢牢地被限定在其所属的解释群体和社会语境之中。他说:“反基础主义并未放松对主体的限制。相反,它只是揭示出主体总是早已被拴定在语境的基座上,这种语境是他的构成要素并且使他得以理性地行动”(Fish “Consequences” 113)。读者总是处于某个有着共同信念和语言规则系统等制度性预设的“解释群体”之中,所谓独立的阐释者并不存在,我们根本不可能摆脱那些制度性预设的约束,也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形成和表达个人意见。其次,反基础主义也不会让人们变得更宽容,它不会散播“什么都行”的心态,因为它只是重新描述了一下我们一直以来别无选择的行为,即我们永远不可能率性妄为,而只能依据那些内在地构成我们的信念和意识结构的标准和规范来做事。对我们的信念来源有了更新的解释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质疑、乃至自愿放弃它们。比如女权主义可以让一位传统男性批评家认识到自己的某些解读存在性别偏见,但不一定可以让他由此转变为真正的性别平等主义者。所以费什的结论是:“理论没有后果。基础主义理论没有后果是因为它的计划没法实现。反基础主义理论没有后果则是因为,作为一种关于我们的信念缘何而来的信念,它并未真正伤及那些信念”(Fish “Consequences” 115)。

费什批评基础主义理论家们错把理论当成超越于实践之上的东西,而事实上“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形式,和任何实践一样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之中,而且和任何其他情形一样,它的引入能否带来改变?改变的程度如何?这些都无法被事先决定”(Fish “Doing” 156)。换句话说,理论自身并没有“保证产生后果”的属性,后果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事件,只有对理论的效果(effect)进行经验的和历史的调查才能够发现。虽然理论常被作为一种修辞用

来说服别人并改变其观点,但这种后果不是必然的。一种理论在特定语境下的效用完全依赖于它与该语境之间是否存在能够被特定解释群体感知到的相关性。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实用主义者们都坚持的共同信念,即,理论的“真实性”(或者说真理)就在于其有用性,一种理论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有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无用。理论的被接受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过程,而是必须与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必须有利于人,能够为人们理解和开辟新生活而服务。因此,批评的核心问题也就不是如何解释文本的问题,而是怎样使用文本的问题。

费什认为,文学理论充其量只是对解释行为的描述,而不是解释行为本身,因此它不会带来任何实践后果。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过于违背常识:难道各种文学理论不是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以往对文本的某些看法了吗?诸如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不是早已彻底推翻了传统自由人文主义的批评传统了吗?这些后果难道不是理论造成的吗?然而费什却用一种几乎狡辩的方式回应说:“它们一点也不是。这只能说明主题先行(thematizing)依然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作品被发现是这种或那种考量的文学表达,不管它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性别的抑或其它。而这位主题先行的批评家由此得出的便是对文本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抑或哲学的解读”(Fish “Consequences” 124)。费什的回答虽然有点狡辩,但他也的确戳中了当前文学批评界在理论运用方面的软肋。自从文学理论在批评界盛行开来之后,“从某个角度解读某个作品”成为常见套路。很多人不注重文本细读,而是用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去生硬嵌套,产出了大量的肤浅成果。如果说这就是理论的后果,其价值和意义值得怀疑。

在对过往理论家的错误做法进行批判之后,费什对待自己的主张显然态度极为谦卑。他说:“我的理论只是一个文学主张,对文学批评实践而言毫无指导性。也就是说,我所说的话并不要求你应该或反对按照某种特定方式从事文学批评”(Fish “Is There A Text” 370)。他认为自己正在宣扬的东西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在有关文学的本质和批评的方式等问题上的信念,进而也就不会改变他们的实践,因为真正影响批评实践的是信念,而非理论。

卡勒曾经提出理论是具有“反思性”(reflexive)的“思维的思维”,“是对文学或其他话语实践中意义

生产范畴提出的探究”(Culler 15)。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论反思来净化批评的工具和方法,从而为知识的生产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然而这在费什看来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也不可能仅通过反思就可以摆脱自身所处的各种利害关系,也就摆脱不了自己的信念,“一个人无法与他自身的信念和假设拉开距离,这就意味着对他来说,它们并不比其他他人或自己之前持有的信念和假设更有权威”(Fish “Is There A Text” 361)。按照实用主义的先驱皮尔斯的看法,所谓信念就是人们从外界接受或内在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观念和看法,“不是意识的某种瞬息间的样态,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思想习惯”(皮尔斯 11)。信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不被察觉的过程,其最根本特征是对人的行为起着构成性和规范性作用。不同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经验决定了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信念则带来不同的批评和解释。信念从根本上决定并构成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它们是前反思的,我们永远无法超越它们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或否定,就好比 we 永远无法直接看到自己的眼睛一样:

理论是意识的特殊成就,信念则是任何意识产生的前提。信念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思想的凭藉[……]理论是某种你可以拥有的对象——你可以在与之保持距离的情况下运用和持有它;而信念则拥有你,也就是说在信念和它导致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距离。 (“Consequences” 116)

即便理论家竭力对自己的信念做出反思,这种反思也只能是皮尔斯式的“怀疑”,即,怀疑并非是在信念之外找一个立足点来全盘质疑信念,而是信念进行自我“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中既有旧信念的丧失,又有新信念的养成。换言之,反思内在于信念的历史之中,所以它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最终能够定义我们自身、并决定我们做出何种选择的东西是信念而非反思。

#### 四、余论

到此为止,我们终于可以对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了。他所谓的理论没有后果是有前提的,那便是,只要我们把文学理论当

成某种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可以更准确解释文本意义的东西,那么这样的理论便不会产生人们期待的后果,原因在于:

任何在你看来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东西,其实只有在你所处的特定群体或制度结构中才会如此。这意味着即便你听信了我的观点,你也永远不可能跳出这些群体或结构来思维和行动。一旦你停止进行对自身某些信念或假定的理论思考,你立即又会毫无保留的重返这些信念或假定之中。(Fish “Is There A Text” 370)

反过来,只要我们不再把理论看得高于实践,而是认识到它也只是一种毫无特殊优越性的实践形式,那么它还是可以带来值得高兴的后果的,比如它深刻改变了文学理论在文学专业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地位,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学理论热,为很多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带来声誉和物质回报等等。只是这一切后果均不会翻越学术的围墙,更不会像左派理论家们曾经设想的那样在政治层面上带来改变。

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正式出现在1980年代,那正是希利斯·米勒所说的“理论的胜利”(Miller 283)的年代。各种新奇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对传统文学研究造成巨大冲击。有人对理论心生畏惧并坚决抵制,认为它内容枯燥晦涩,让一流的批评家退变为蹩脚的哲学家,操着从别处借来的半生不熟的术语笨拙地在文学课堂表演上。与一贯讲究以细腻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的实用批评相比,文学理论简直就是“非美国式的”(Spivack 672)阅读和思考模式。而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还对传统人文价值构成巨大危害,它们让玩世不恭的虚无精神弥漫在文学批评界。另有一些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奉理论若无所不能的神明,认为它不但可以改进我们的阅读和批评,还可以带来更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他们号召:“理论必须向人们表明,仅仅质疑、抵制、理解或是掌握文本都是不够的,理论家们应该期待寻求并验证在真正的社会集团之间(如学生、教师、系主任、政治家以及企业家等)引发后果。那些始于理论并终于理论的思想降低了理论的价值”(Bloomfield 414)。希利斯·米勒还把拯救人文研究的神圣使命托付给了理论,认为“要想让文学避免被隔绝在唯美主义的有机形式之中从而失去对社

会的任何有效作用,文学理论是唯一的解救办法”(290)。

与这两种反应不同,费什则告诉人们不必害怕理论会带来消极后果,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可以作为理论探索的精神,却不可能摧毁生活中的一切信念,因为怀疑主义者自身终究离不开某种信念作为自己的立足地。另外,我们也不必期望理论可以带来多少积极后果,虽然它似乎在文学课堂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但对窗外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却是无关痛痒,因为支撑后者的不是理论,而是日常生活的物质状况。他坦率直言:

在一个以理论生产为最要紧之事的语境下,如果某一理论战胜了其他竞争对手,这的确会带来巨大变化,因为这将彻底重新划分该语境中的权势对比。但在理论生产不过是众多生产部门其中之一的环境下,理论的影响却会被中和、稀释、有时甚至几乎让人毫无觉察。(Fish “Doing” 28)

费什的“理论无后果说”并不是要劝说人们放弃文学理论、重返理论之前的那个纯真年代,而是让人们重新审视理论究竟可以带来哪些后果。他奉劝人们,只要我们在理论研究上不再纠结于真假对错问题,那么理论就还是值得做下去的。理论不会成为解释文本的万能钥匙,理论家不必好高骛远,而应该“收缩我们的抱负,把我们的主张限定在那些在学科意义上可被理解、可以实现的方面上”(Fish “Theory” 374)。对费什来说,理论的世界就是一个各路理论家们尽情表演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占据一个既无权又无责的“主角”地位。文学理论只能改变阅读却不能改进阅读,理论家可以谈论真理却不能生产真理。场内热热闹闹,场外我行我素。曲终人散之后,大家起身离场,顺便不忘带走各自的报酬。

不得不承认,费什的见解并非全无道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喧嚣,理论界逐渐归于平静,我们今天甚至不时听到各种关于理论终结的话语。<sup>②</sup>现实似乎已经表明,理论并未在学术之外留下多少痕迹,社会似乎依然如故,真理仍旧遥不可及。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意完全接受费什的主张,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文学理论终究可以在我们迈向真理、改造现实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否则文学理论岂不真的成为他所说的“超级玩世不恭的行为”(Fish “Is There

A Text” 358)?

#### 注释[Notes]

①类似的想法也出现在很多其他理论家那里,例如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理论就是“一些普遍原则外加一套术语、区分和范畴,被用来识别和分析文学作品,此外还包括用来评价那些作品及其作者的一些批评准则(标准或规范)”。参见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50. 而卡索(Gregory Castle)也把文学理论理解为“指导批评实践所需的一些原则和概念,策略和方法”。参见 Castle, G.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2.

②当然,所谓“理论的终结”并非指的是国内语境中的“文学理论”,而是特指20世纪后半期在北美语境中流行的“大写的理论”(Theory),这种理论通常被分为两类,一是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或依据的“肯定的理论”(亦即本文所说的“基础主义”),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二是作为反思的“否定的理论”(亦即“反基础主义”),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前者强调应用,后者则把理论视为更独立的“事业”。卡勒曾对这种“大写的理论”做过非常精彩的专论,在此不作赘述。而按照国内对“理论”的理解,任何思想和学术都不可能没有理论,因而也不可能终结。参见汤拥华:“文学理论如何实用?——以美国新实用主义者对‘理论’的批判为中心”,《文学评论》6(2012):188;以及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P, 1997) 1-15.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Bloomfield, Morton W. “Literary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urvey.” *New Literary History* 14. 2 (Winter 1983): 409-51.
- Castle, Gregory.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7.
- 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 林书武 沈家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 [Chomsky, Noam. *Aspects of the Theory in Syntax*. Trans. Huang Changzhu, Lin Shuwu and Shen Jiax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6.]
-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P, 1997.
- Fish, Stanley. “Consequences.” *Against Theory: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New Pragmatism*. Ed. W. J. T. Mitchell. Chi-



- 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Theory’s Hope.” *Critical Inquiry* 30. 2 (Winter 2004): 374–78.
- Hirsch, E. D.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Levinson, Daryl J. “The Consequences of Fis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80. 7 (Oct. 1994): 1653–98.
- Miller, J. Hillis. “Presidential Address 1986: The Triumph of Theory, the Resistance to Reading,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Material Base.” *PMLA* 102. 3 (May 1987): 281–91.
- 查尔斯·皮尔斯:《皮尔斯文选》,涂纪亮编,涂纪亮 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Pierce, Charles. *Selected Essays of Charles Pierce*. Ed. Tu Jiliang. Trans. Tu Jiliang and Zhou Zhaop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 Documentation Press, 2006.]
-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Trans. Xu Wenr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Spivak, Gayatri C. “Reading the World: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80s.” *College English* 43 (November 1981): 672–73.
- 韦勒克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 [Wellek, Rene, and Austin Warren. *Literary Theory*.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责任编辑:王嘉军)
- 
- (上接第26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 [———.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5.]
-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6 (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 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Marcuse, Herbert. *Eros and Civilization*. Trans. Huang Yo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Yiwon Press, 1987.]
- 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民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Ollman, Bertell.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Trans. Wang Guimi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 [———.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Trans. Tian Shidian, et al.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1.]
- 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
- [Prawer, S.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Trans. Mei Shawou,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 [Wellek, René.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3. Trans.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Yiwon Press, 1997.]
- 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 [Wolff, Jonathan. *Why Read Marx Today?* Trans. Duan Zhongqiao.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Zhou, Xian. *20th 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 [Zis, A. *Found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Trans. Peng Jixiang.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Press, 1985.] (责任编辑:王嘉军)